

# From Historical Heritage to Culture Industry


Landscape Reconstruction  
of Tongguanyao in Changsha

# 从历史遗产 到文化产业

长沙铜官窑景观再造研究

鲁雯·著

非外借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From Historical Heritage to Culture Industry

Landscape Reconstruction  
of Tongguanyao in Changsha

---

# 从历史遗产 到文化产业

长沙铜官窑景观再造研究

---

鲁雯·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历史遗产到文化产业：长沙铜官窑景观再造研究 / 鲁雯著.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9

ISBN 978 - 7 - 5648 - 4370 - 0

I. ①从… II. ①鲁… III. ①官窑—瓷窑遗址—研究—长沙 IV. ①K878. 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204425 号

## 从历史遗产到文化产业——长沙铜官窑景观再造研究

Cong Lishi Yichan Dao Wenhua Chanye——Changsha Tongguanyao Jingguan Zaizao Yanjiu

鲁雯著

- ◇出版人：吴真文
- ◇责任编辑：孙雪姣 赵婧男
- ◇责任校对：蒋旭东 陈艳丽
- ◇出版发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区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 88873071 88873070 传真/0731 - 8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 ◇经销：新华书店
- ◇印刷：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 ◇开本：710 mm × 1000 mm 1/16
- ◇印张：18. 75
- ◇字数：320 千字
- ◇版次：2021 年 9 月第 1 版
- ◇印次：202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书号：ISBN 978 - 7 - 5648 - 4370 - 0
- ◇定价：68. 0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导论 .....            | (1)   |
| 第一节 研究主题与选题缘由 .....     | (1)   |
| 第二节 已有研究与相关述评 .....     | (4)   |
| 第三节 田野简况与研究思路 .....     | (23)  |
| 第二章 从考古遗址回溯历史生活景观 ..... | (33)  |
| 第一节 考古遗址及其空间史 .....     | (33)  |
| 第二节 窑炉周边的历史场景 .....     | (57)  |
| 第三节 弹性的历史空间边界 .....     | (86)  |
| 小结 .....                | (95)  |
| 第三章 地方陶瓷技艺集体化与市场化 ..... | (97)  |
| 第一节 围厂而聚的集体生产 .....     | (98)  |
| 第二节 私营陶瓷产业的兴起 .....     | (120) |
| 第三节 当代制陶与文化旅游 .....     | (128) |
| 小结 .....                | (140) |
| 第四章 地方景观遗产再造与权力网络 ..... | (143) |
| 第一节 地方景观变国家遗产 .....     | (144) |
| 第二节 遗产保护的权力场域 .....     | (149) |
| 第三节 “非遗”及其承认的权力 .....   | (166) |
| 小结 .....                | (179) |

|                         |       |
|-------------------------|-------|
| 第五章 文化遗产的资源转化与消费 .....  | (182) |
| 第一节 文化景观与城市更新 .....     | (182) |
| 第二节 商业景观与遗产利用 .....     | (201) |
| 第三节 消费主义与景观塑造 .....     | (211) |
| 小结 .....                | (221) |
| 第六章 产业发展中的技艺传承与创新 ..... | (224) |
| 第一节 铜官窑风格的再定位 .....     | (225) |
| 第二节 工艺审美的本土评价 .....     | (243) |
| 第三节 传承中的分、继、合 .....     | (258) |
| 小结 .....                | (264) |
| 第七章 结论 .....            | (267) |
| 第一节 文化遗产景观再造要素 .....    | (267) |
| 第二节 权力、资本与景观再造 .....    | (271) |
| 第三节 产业化中的技艺张力 .....     | (274) |
| 第四节 “分继合”与文化自觉 .....    | (277) |
| 参考文献 .....              | (281) |
| 后记 .....                | (294) |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主题与选题缘由

本书旨在考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生活景观被逐步转化为文化产业的过程，及其中不同主体所持文化资源、权力和资本的互动机制，探索景观的社会再造规律，以及应有的文化自觉意识。

2018年，湖南省长沙市北部郊区铜官发生了一件“文化大事”——长沙铜官窑博物馆正式开馆。我在长沙工作，曾较长时间从事艺术设计方面的研究，本就对长沙铜官窑有一定了解。

望城原本总体上属于长沙北郊的农村地区，该地区的铜官镇有部分村民从事烧陶工作（之后行政区划多次更名，除特殊场景表述需要之外，为方便读者阅读连贯，以下统称望城铜官镇）。20世纪50年代初，有考古工作人员在铜官镇发现和发掘了一个唐代陶瓷业的遗址，称其为长沙铜官窑。1988年，长沙铜官窑遗址被认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该遗址又被确定为国家“十一五”期间100个重要遗址保护项目之一，2010年再被列入全国第一批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2018年5月，“黑石号”沉船的文物被从印度尼西亚运回国，其中162件（套）被送回到其产地长沙铜官窑，并在长沙铜官窑博物馆展出（“黑石号”沉船本于1998年在印尼苏门答腊海域被渔民发现，有6万多件珍贵文物被打捞出来，其中超5.6万件产自长沙铜官窑），这也标志着该博物馆正式开馆。在博物馆的旁边是当地风景最优美的石渚湖，湖边有制陶业的石渚草市，在当地不少宣传材料中常被誉为唐代制瓷“世界工厂”。2018年8

月，在石渚湖与博物馆中间，同时紧邻石渚草市的农地上，由中国民营企业唐瓷集团兴建了一片占地三千亩、名为唐瓷“铜官窑古镇”的建筑群（以下简称“铜官唐瓷”<sup>①</sup>），与2009年由长沙市望城区政府打造的“铜官老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之后，铜官唐瓷被列为全国优选旅游项目、“一带一路”建设样板工程、湖南省和长沙市重点大型综合文化旅游项目。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百亿打造的丝路文旅古镇”“穿越千年的博物盛宴”等说法更为这个小镇增添光辉色彩，大量访客慕名来到铜官镇，观瞻历史遗址和游玩。

然而，数月后，“空城”“鬼城”“退铺”“退租”等有关铜官唐瓷的负面消息频频在微信、博客、互联网上出现。据说，此次“退铺”“退租”行为是位于铜官老街的商户们联名针对铜官唐瓷展开的。在表面上，这场较量在老街与取名为“古镇”的新镇区之间发生，双方都想借助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强大的媒体宣传，争夺铜官窑旅游业带来的客流量。

不过，如果回看老街的历史就会发现，虽然它确实依托了铜官镇传统农村集贸市场的街道，但自2009年重修以来，其实基本上也都变成了新房子，只是外貌上遵循了“修旧如旧”的理念，看上去较为“古朴”。老街翻新工程是在望城区政府和旅游局的监督下展开的，街上房产多半属于镇政府，另有一部分属于集体所有。老街上那些与铜官唐瓷争夺利益的商户，绝大部分也并非铜官镇传统农村集贸市场上的居民，而是该镇其他村民，甚至是铜官以外来租房子的人。所以，这场较量不仅仅是一场当地人关于“新”与“旧”、“传统”与“开发”之间的争议，还隐含了在“开发”和“保护”铜官窑的名义下，与铜官窑有关联的多种类型的主体围绕地方空间、权力、文化资源等问题展开的博弈。

因所学专业的关系，长沙铜官窑博物馆开张，本就激起了我的研究兴趣，而此后经过初步了解得知，围绕着已远非考古遗址或铜官窑陶瓷烧制传统技艺的所谓“铜官窑”，当地正产生各种复杂的互动，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追踪观察和深入研究的经验现象。

在理论讨论潜力上来说，以上各类主体的互动至少涉及了文化主体性、

---

<sup>①</sup> 除特殊注明外，本书中所用材料均为作者实地调查所得。为保护被调查者隐私，书中所涉企业名称和部分调查对象姓名已遵照学术规范匿名化处理。

文化资源、资本、权力及景观再造等文化人类学方面的问题。由此设定议题并展开深入研究，在文化人类理论探讨方面，应该也是有价值的。例如，一方面，尽管铜官镇逐步增设了一些文化景点，为各类主体致富提供了新的可能，但在本地人、小商户、大资本及地方政府等主体之间，依然存在着重重张力。并且，这些张力并没有随着文化遗产名录扩展得到缓解，相反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另一方面，他们之间又不仅仅是竞争关系，因此虽然有张力，却也不约而同地有“合作”的一面。不仅是铜官唐瓷和老街，还有从湖南省到铜官街道办事处各级政府，都在力图加大投入打造“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下简称“遗址公园”）。

2011年，铜官陶瓷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遗址公园核心保护区的修筑及周边环境景观建设也在不断丰富这一遗产的社会含义。尤其是在长沙铜官窑博物馆建成后，讲述铜官窑遗产历史，成为一种多方主体的利益表达，并试图渗透到地方和官方的话语之中。从遗址公园到博物馆，从老街到铜官唐瓷，各种“规划项目”落地，为铜官镇催生了大量的新地标。在某种意义上，这完全符合政府“打造湖湘文化名片，建设国家遗址公园”的总目标，以及“发掘文物资源优势，打造旅游特色名村”的总要求。观光游览的地理空间迅速得以扩增，大资本朝着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安排着自己的运营，地方政府在打造政绩“名片”的同时还获得了财政收入，当地几个社区和村庄也因发展旅游业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如此一来，在铜官镇，这些具有不同开发目的的景观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重叠，而且因为相互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利益纠葛。没有一个空间在被开发成后，与一个稳定的地方群体相关联。相反，不同群体在博弈中都宣称只有自己才有资格塑造和经营某一景观。即使有相当一部分人原本并非铜官老街居民，甚至并非铜官镇辖区内任何一个村庄或居委会的人，而仅仅是在某些旅游景观兴建之后才迁入的，但事实上却也以“常住人口”的身份在重塑当地生活景观。甚至可以说，正是人员结构的多样化，构成了当代铜官生活与传统不一样的“风景线”，不同人群的生活实践为当地由一个农业型小镇快速城市化注入了活力。

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主义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一个陶瓷

产业文化区正在“复兴”。在这个过程中，手作的传承与创新、资本的累加与博弈、空间的形塑与变迁都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形态。我们很难清晰地区分谁是传统，谁是现代，或者多久算是传统，何时又是现代。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人们都在尝试以“铜官窑”的名义，以一个地理空间来建构、表达或限制区域范围内各种文化意义的生成与群体利益。正是他们的各种努力和互动，从根本上塑造了铜官镇各种景观的基本面目。由此，本书的核心论述并不在于讨论单一文化遗产中的传统特征及其形塑过程，而是将尝试将这场传统文化“复兴”运动置放在长时段地方性空间内部视野下，去考察不同利益主体围绕地方文化资源、权力和资本展开的博弈。

## 第二节 已有研究与相关述评

本书的研究将聚焦于景观的再造过程，及其中不同主体围绕文化资源、权力和资本而形成的互动。文化人类学对于景观的研究，在这方面已有较深厚的积累，可供本研究作参考。同时，本书所涉及的景观再造过程，与铜官镇的文化遗产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各类主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学界已有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以及文化遗产产业化的讨论，也对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 一、景观的文化权力透视

在现代文化人类学早期的民族志中，景观虽未被当作专门的议题予以对待，但客观上还是得到了关注。例如，埃文思-普里查德在描述努尔人的社会生活时，离不开其空间背景描述，<sup>①</sup>而列维-施特劳斯的热带旅行记录，也不乏对当地聚落空间、生态环境的描述。<sup>②</sup>在古典人类学的民族志当

① [英] 埃文思-普里查德：《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褚建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9页。

② [法] 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6页。

中，也不乏对景观的关注。例如，摩尔根对北美洲土著家屋空间的研究，<sup>①</sup>广义上也可算文化人类学聚焦景观的经典之作。

不过，文化人类学将景观作为一个专门议题进行研究，则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1989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召开“景观人类学”学术会议，其后出版了论文集《景观人类学：关于地方与空间的观点》，<sup>②</sup>可算作标志性的事件。与此大致同时期，巴巴拉·本德（Barbara Bender）等人共同撰写的《景观：政治与视角》一书，更是标志着文化人类学对景观的研究，与地理学、考古学和政治学等交叉了起来，对景观中蕴含的政治关系予以了透视。<sup>③</sup>此后，法国哲学家德波在20世纪60年代本就已经提出来的“景观社会”的理论，在文化人类学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该理论以“日常生活革命”作为自己的议题，聚焦于社会批判和文化证伪，认为当代西方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景观”阶段，即生活细节异化成了景观形式，徒有表征，而无实质内容。<sup>④</sup>

不过，要想知道“景观”是什么，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像英格尔德说的那样，“我只能从解释‘景观’不是什么来开始”，进而他自信地说，“‘景观’不是土地（Land），不是自然（Nature），不是空间（Space）”。<sup>⑤</sup>以否定性形式来认识“景观”，实际上是拒绝通过结构拆分与重组的形式确立内涵的方式。

“景观”往往强调一种不可计算性，因此也就拒绝了一种对象或影响条件的简单增减。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景观研究”的发展并不是从自身概念的提出开始的，而是从20世纪末社会科学领域对“空间”概念的批判中开始的。“空间”作为基本的人类认识自然的状态，从工业革命以来一直是人类科学地认识世界的一个基础性概念。在文化人类学领域，列维-施特

① [美]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美洲土著的房屋和家庭生活》，李培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页。

② E. Hirsh M. O'Hanlon, *The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Perspectives on Place and Spa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③ Barbara Bender *Landscape: Politics and Perspectives*, Oxford: Berg, 1993.

④ [法]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174页。

⑤ Tim Ingold, *The Temporality of the Landscape*. *World Archaeology*, 1993. Vol. 25, No. 2. pp. 152-174.

劳斯沿着摩尔根家屋研究的路子继续往前走。他认为，这种“家屋社会”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总是倾向于侵入社会领域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利益尚未克服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古老的血缘联系’”。<sup>①</sup>这也就是说，“空间化”的分析概念，预设了一种亲属制度向地缘性的政治经济关系转变的过程。但是，我们仍然要意识到，以家屋作为分析单位，并不意味着这种空间作用的过程就是从内向外的。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家屋空间的向外开放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就像纳德尔曾提醒我们的那样，“我们面临着连续的在时间和空间中扩展的特征，这些特征要求我们不断地对行动的打破和再结合进行考察”，这种考察又要求我们“不断地超越一种隔离状态，并把背景空间与前景空间相互交替”。<sup>②</sup>

近代资本主义重建空间价值的论述，首先要提到的是福柯对空间规训的研究。他在论述欧洲疯人的空间安排中，就详细说明了一种从隔绝到收编的过程。中世纪的疯人船把疯人排除到了城市的空间外。相对城市来说，城市外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由的”，空间的划分是以“文明”与“野蛮”来区分的。<sup>③</sup>换句话说，不存在一种既非文明又非野蛮的空间，空间一定是具有社会价值色彩的。这样的论述同样出现在斯科特对佐米亚地区的历史考察中。他认为，山地文明由于不能被低地文明收编，进而被赋予了空间上的“野蛮性”。<sup>④</sup>

不过，近代以来，空间开始逐渐“客观化”，变成了不具备价值判断的客观的“数字”。空间的客观化带来的问题是，它可以通过另一种途径被重新利用，并在利用中重新赋予价值，这种方式就是资本。资本以一种“客观化”的方式建立起了对“空间”的统治，这种统治不再只在“文明”的区域里进行，而是拓展到了每一个地方。因此从福柯的角度来讲，空间的客观化是一个权力的问题。但空间的权力关系一旦建立，其自身也就相应地具备了一个再生产的机制。就像列斐伏尔分析的那样，客观空间的权力

---

① [法] 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面具之道》，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3页。

② S. F. Nadel,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Anthropology*. London: Routledge, 2004. p. 76.

③ [法] 福柯：《古典时代疯癫史》，林志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页。

④ [美] 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页。

生产是通过“科学化”的语言进行的，这就是现代专家系统。空间的客观化让空间所负载的时间，包括历史、现在与未来，产生了分裂并对如何生产空间提出了新的要求，正是“受过训练的众多专家试图回答这些问题”。<sup>①</sup>这些专家不仅肩负起了对城市空间设计的任务，还在多个领域内促成了学术语言的转变。

学术语言的转变进一步把地理空间卷入意义阐释与争夺的场域之中。随着本体论转向与现象学学派研究的兴起，空间的客观化遭到了质疑。在这两种视野下，“客观化”并没有真正消除价值判断，而是美化了它，并在新的权力关系中重新进行了价值化，空间不是均质的，而是特殊政治经济关系的再生产过程，即梯莱说的“没有单一纯粹的空间，只有各式各样的空间”。<sup>②</sup>

这些讨论让我们认识到，空间并不是“自然地”产生的，就像“自然”经历了概念上的变化一样。自然的空間在中世纪只包含“地上的”部分，这是与一种“垂直系统的宇宙”观相一致的。<sup>③</sup>这种宇宙观包含了一个社会面向与神话面向的两极统一，进而在时间的循环中保持了空间上的差异性。然而，近代随着科学的兴起与笛卡儿的反思，空间开始成了时间连续上面的均质的“地平线”，进而“自然”与“空间”开始一致。

实际生活是空间所隐蔽在后的状态，是空间话语生成的具体过程。进而，生活空间是一个地理空间、人际关系与意义表达在历史中交互形塑的过程。不同的政治经济关系带来了不同的文化阐释，不同的意义阐释进而形塑了身份权力的博弈过程。景观化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景观化研究的是景观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在景观中构成社会问题的过程。景观化研究意味着，地理空间的形塑与人际关系的再生产是同步发展且相互影响的，并一同卷入了社会文化的生产过程。

景观同对空间的批判一样，其本身也并非是一个可数的对象。除此之外，在景观人类学的讨论中，景观还保留了一种动态的过程，正像英格尔德说的那样，“这里没有什么空洞等待着被填充，所以，所有填充都是一次

①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London: Blackwell Press, 1991, p. 37.

② Christopher Tilley, *A Phenomenology of Landscape: Places, Paths and Monuments*, Berg Publishers, 1994, p. 10.

③ [美] 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45-150页。

重塑”。<sup>①</sup> 景观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景观永远是博弈的、动态的与历史的。景观也意味着没有静止的状态，任何一个切入点既意味着过去，也意味着未来，当然还包括现在。这种流动不仅是人的流动，也不仅是土地的直观变迁，而真正促进景观化进程的是其中的权力关系，以及权力关系下的人的生活经验所带来的认同。这正如梅尼格所指出，我们必须明白一个“权力的现实”，那就是“生活必须永远活在已经形塑好的过去”。<sup>②</sup>

引入权力关系于景观之中，米切尔曾总结六点分析性原则：景观是被生产的，是积极的行为，是有意识的物理干预；任何景观或多或少都是功能性的；没有景观是地方的；历史非常重要；景观就是力量；景观是社会正在进行的空间形式。<sup>③</sup> 这六点原则并不能单独来看，从根本上看，景观被认为是一个权力转换的过程，而这种转换需要有一个表达的方式和契机。这正如列斐伏尔所说，必须在整体上关注一种权力的产生与空间的关系，因为空间“集中了财富、权力、信息、知识、文化”等方面的关系。<sup>④</sup>

由此，景观不仅仅通过权力关系被生产出来，景观本身还对权力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谁的景观与景观是什么，很多时候可能是同一个问题。达比在研究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和风景的关系时就曾发现，政治经济身份的区隔并不是被语言表达出来的，而是被风景表达出来的。她认为，“改革者将进入休闲风景区与社会改革联系在一起”，推动了“公用地上的群众示威、革命象征符号的出现、向议会提交请愿书的庞大的游行队伍”，这使得“进入公用地充满了政治含义”。<sup>⑤</sup> 在这里，景观不再仅是一种权力关系，还是混合了政治经济影响下的文化身份，正如米切尔所说，“景观不仅仅表

① Tim Ingold, *The Temporality of the Landscape*, *World Archaeology*, 1993, Vol. 25, No. 2. pp. 152 - 174.

② D. W. Meinig, "The Beholding Eye: Ten Versions of the Same Scene," in D. W. Meinig, 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33 - 48.

③ Don Mitchell, "New Axioms for Reading the Landscape: Paying Atten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al Justice," in Wescoat Jans and Douglas Johnston, eds. *Political Economies of Landscape Change: Places of Integrative Power*, New York and London: Springer, 2008, pp. 28 - 50.

④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进入都市的权力》，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2 - 107页。

⑤ [美]温迪·达比：《风景与认同》，张箭飞、赵红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 - 128页。

示或象征权力关系；它是文化权力的工具”。<sup>①</sup>

值得注意的是，说景观是一种“文化权力的工具”，其实仅仅表明它是一种文化权力形塑的过程，而不意味着景观一定为某一种权力服务，并生产出某一种权力。理解景观的关键在于，权力与认同并不是结果，而是过程。这一特点也是从对空间的客观化批判之中承袭下来的，注重景观在多个意义上的流动性。在这个意义上，首先，景观成为一种博弈的场所。景观所表达的权力关系与身份意识是通过不同人在不同时空下的互动带来的，而不是一种给定的过程。其次，景观不仅仅为博弈提供了一个场所，还塑造了博弈的方式，甚至是以博弈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的身体。为此，英格尔德希望通过把身体的运动直接引入到地景中来，使用“践景”（taskscape）来表达地景内的一种集中的综合实践活动。<sup>②</sup> 通过身体，地景同样“再现了一种对话的体验的感性的回归”。<sup>③</sup> 再次，景观的流动感也在异文化的解读中被创造出来。不同的景观可以被不同的人解释。如柯楠通过分析马林诺夫斯基和戴斯考拉所撰写的民族志发现，对于景观，“不同的社会结构产生除了不同的审美经验和不同形式的审美表现”<sup>④</sup> 由此，在王斯福和英格尔德看来，景观不仅是一种“旅游风景”，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更是一种具体空间的“制作过程”<sup>⑤</sup> 和“生成的过程”。<sup>⑥</sup>

不过，虽然景观受到权力的影响，但就现实来说，既有的权力结构可能既不统一，又并不必然都发挥同样的作用。要解释风景背后的权力结构，以及这种结构背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就必须深入讨论围绕景观而展开的实践过程。通常来说，这种实践性的竞争会在如下几个方面得到呈现。

① [美] 米切尔：《风景与权力》，杨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② Tim Ingold, *The Temporality of the Landscape*, *World Archaeology*, 1993. Vol. 25, No. 2. pp. 152 - 174.

③ [美] 安德鲁·斯特拉桑：《身体思想》，王业伟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页。

④ Michel Conan, "From Vernacular Gardens to a Social Anthropology of Gardening," in Michel Conan, ed., *Perspectives on Garden Histories*, Washington: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1999, pp. 181 - 204.

⑤ Stephan Feuchtwang, ed. *Making Place: State Projects, Globalisation and Local Responses in China*.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 2004. p. 4.

⑥ Tim Ingold, *Making: Anthropology, Archaeology, Art and Architecture*, London: Routledge, 2013, p. 21.

首先，景观化参与空间的命名竞争。

正如米切尔所指出，景观问题是一种关于权力的文化竞争，竞争主体首先要做的就是命名。<sup>①</sup> 在空间命名方式中，权力的竞争往往会被激活（如就本书来说，究竟老街算“古镇”，还是铜官唐瓷新建立起来的建筑群算“古镇”）。对此，段义孚也指出，“操纵不同环境类型的智慧”，首先就包括了“给我们经历的特别事物进行命名”，内部视角可能拥有更多的亲密感，但却经常没有具体的形状，而外部视角拥有象征符号特征，但却缺乏真实感。<sup>②</sup>

景观化过程之所以强调地点的重要性，是因为地点往往拥有具体的名字。如巴苏对西阿帕奇人的研究，就详述了地点如何通过名称被不同的祖先记忆所传承。<sup>③</sup> 这些名字记录的地点可以唤起一种自我描述的权利，而不是他者赋予的地名记录。但对地点生活空间的确认，不只是通过名称的传承来实现，有时候需要通过对名称的竞争来实现。在这里，重要的是“命名”过程本身塑造了一个竞争性的公共空间。

与此同时，并不是说没有命名就意味着人们不能进行景观化的努力。一些城市公共空间具有较强的排他性，纵使它只是一个城市空间的分类。如晚清民国时期北京城所谓的“东富西贵，南贫北贱”，其特殊之处在于避免了在正式或公开场合进行命名，而同时这种“非名化”的方式本身与命名具有相似的效果。

其次，景观记忆也涉及文化遗产。

公共场所景观化需要具体的表现形式，文化遗产则是最能体现地点的公共特殊性。遗产的确立是与遗产保护相互关联的，无论是建筑还是出土文物，这些传统考古学、建筑学中的古代遗迹都以遗产的形式被公共性地保护起来，形成了一个具有特定地理空间与制度形态的景观。以景观为中心的遗产保护，往往被认为可以发挥更大的公共性力量，这种力量主要体

---

① Donald Mitchell, *Cultural Geograph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Blackwell, 2000, pp. 1-34.

② [美] 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宋秀葵、陈金凤、张盼盼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00-202页。

③ Keith Basso, *Landscape and Language among the Western Apache*,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96, pp. 77-82.

现在激发地方参与和行动上面。<sup>①</sup>也就是说,景观化把公共保护政策从宽泛的公共视线拉入公共行动当中,因此也就更能激发地方人员的参与、地方价值的表达以及促进地方协商机制的运作。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同样以一种景观的视角来看待遗产保护,只是这种景观化的对象和影响范围远远大于遗产保护的对象和影响范围。

虽然所有的物质空间,尤其是公共空间,都或多或少地涉及集体记忆的问题,但在遗产保护中,记忆过程被置于最显著的位置,并且披上了一种历史客观连续性的伪装。正如马修斯所指出,遗产让我们以一种不会怀疑自身身份的方式生产着认同、发展着乡愁。<sup>②</sup>通过遗产所聚焦的公共利益与其创造出来的有足够关切感的共同体,遗产所叙述的历史在现实世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我们是谁”的稳定认识。

遗产的景观记忆不仅仅是一种陈述,而且有现实互动性,其保护行动是一种现实的动员与互动过程。就这一层次的景观遗产来说,历史记忆既是一种复原和保护,也是一种展示的过程,即形塑一种观看遗产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对物质世界的叙事隐含了一种等级规则的生产与合法性的建构。<sup>③</sup>尤其是当代中国的遗产景观,文化遗产认定往往既是政治性的国家身份的确立,也是文化性的地方身份的确立。这两种身份的交融使得景观可以进入更为多样化的身份政治之中。

再次,景观化在市场叙事中参与意义再造。

景观被观看,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旅游,尤其是乡村旅游。在这一过程中,乡村被视为一种“景色”,它反映在人们进入到这种景色中去观看,也反映在对乡村景色的直接描绘中。后来,这在绘画领域反映得尤其明显。但无论是作为旅游的视角还是作为绘画的视角,景观在西方的重新出现本身就伴随着一种视点的重新对焦,而这种对焦背后所表达的新的权力竞争也同样具体地反映在围绕景观的阶级与消费之中。就绘画来说,以莫奈为

<sup>①</sup> Daniel Terrasson, “Research Supporting Landscape Policy,” in Paul Claval and John Agnew, eds., *Landscapes, Identities, and Development*, Aldershot: Ashgate, 2011, pp. 355–358.

<sup>②</sup> Christopher N. Matthews, “Idea of the Site: History, Heritage, and Locality in Community Archaeology,” in Ludomir R. Lozny ed., *Landscapes under Pressur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and Preservation*, London: Springer, 2006, pp. 76–78.

<sup>③</sup> Denis E. Cosgrove, *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p. 8.

代表的印象派表现出一种人与自然的“虚假的等价性”。<sup>①</sup> 这种反映方式的特点在于，它以看似冷漠的地理科学的观察重新塑造了景观中政治身份的合理性，进而积极地参与了社会空间的实践过程。<sup>②</sup>

在当代社会，文化作为市场流通的关键指示系统，在承担日常生活沟通性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了想象图景的跨场景流通。这样一个过程催生了更为细致的消费问题，尤其体现在以文化品牌为中心的消费方面。这就回归到米切尔对文化景观论述的核心，即一种“文化竞争”的博弈状态。例如，祖金就曾分析指出，一个可以支付更高租金的团体也就有理由宣布他们在城市中存在的合法性，但这一点不是通过直接的金融形态展现的，而是通过“文化力量”展现的。通过这种策略，一种道德优越感在“美”的名义下宣布了自我与他者的区隔。<sup>③</sup>

而就中国来说，这种空间的设计过程与景观化所卷入的旅游、消费与艺术精神的表达同样存在关联。只不过在这里，本土设计者在接受西方艺术精神的同时，其直接面对的更多是本土市场，一种本土的陶瓷品艺术为抵挡西方艺术美学的全面替代发挥了作用。与此同时，这种本土的美学设计也被卷入各种主体的权力博弈之中，国内地方的差异性空间为文化竞争提供了可资消费的区域。

## 二、文化遗产产业化反思

1950年，日本出台《文化财保护法》，为世界首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其政策不仅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还有很强的连续性。<sup>④</sup> 我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起步较晚。2004年，我国成为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员国，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在此背景下，国内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得以迅速兴起。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涉及遗产的认定、传承人名录、技术等方方面面，本书

① D. Harvey,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5, p. 15.

② Denis Cosgrove, *Geography and Vision Seeing, Imagining and Representing the World*, London: I. B. Tauris & Co Ltd., 2008, p. 15.

③ Zukin Sharon, *Naked City: The Death and Life of Authentic Urban Pla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3-4.

④ 廖明君、周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日本经验》，《民族艺术》，2007年第1期。